

加拿大与美国移民政策的差异性分析

陈洪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加拿大研究中心, 广州 510420)

摘要: 美国和加拿大是两个相邻的北美洲国家,虽拥有极为相似的自由民主政治文化,但两国的移民政策却有着明显的不同。美国移民政策看重家庭团聚因素,而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则是更多地从劳动力需求和就业能力出发。借助移民政治理论研究美国加拿大两国的移民政策,发现公众舆论对美国移民政策的影响要大于其对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影响,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拉美裔移民的凝聚力远大于加拿大亚洲移民。而加拿大注重多元文化政策,也限制了个别群体主导移民政策的能力和倾向。不过,造成两国政策不同的关键因素还是政治背景和制度的差异。

关键词: 移民政策; 差异性; 加拿大移民; 美国移民

中图分类号: D99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962(2017)03-0099-07

一、前言

加拿大和美国都是接收移民的国家。从移民政策史来看,两国历史上曾执行相似的移民政策,即欢迎来自欧洲的移民而排斥其他地区各种族的移民。二战后两国几乎同时开始了移民政策的变革,目前执行的移民政策是二战结束之后在改革旧的移民政策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移民政策在两国政治中的地位却迥然不同,相对于美国的移民政策来说,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引发的争议却小得多。当然,加拿大也存在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反移民情绪,但有关移民是否合法等问题的政策和争论却比美国要和谐得多。在加拿大,移民政策的改变也不会有美国那么大的反响。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别呢?本文就尝试从制定政策的驱动力角度做一解读。

二、制定移民政策驱动力的相关理论

一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决定因素有很多,既包括该国的制度和传统,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及伦理背景,否则无法解释类似的移民问题会在不同国家产生极其明显的差异。西方学者曾就此问题展开过不同的探索与争论。布鲁贝克和布罗克曼(Brubaker,1992;Brochman,1999)从国家认同的角度出发,认为一国的文化传统及历史经验对移民政策的偏好有着重要影响。弗里曼(Freeman,1995)以移民接收国国内利益团体之间的利益竞争来解释接收国移民政策,并提出了“利益导向”的移民政治理论。而霍利菲尔德和朱普克(Hollifield,1994;Juppke,2001)等学者则从现代人权理论以及法律体系出发来解释移民政策,他们指出

收稿日期:2016-10-18

作者简介:陈洪桥(1978-),男,湖南长沙人,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加拿大内政及外交。

当接收国移民政策背离自由主义传统时,法院往往借助判决挑战政府紧缩的移民政策,从而确保移民的基本权利。近年来,“制度主义”成为移民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研究移民政治的学者,如弗里曼和布雷尔以及吉拉东和朱普克(Freeman、Birrell 2001; Guiraudon、Juppke 2001)等纷纷强调国家在移民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希望从国家制度层面对各国移民政策的趋势进行比较研究。总之国外学者移民政治理论的构建已经相对成熟,而随着中国移民热的到来和海外华人数量的不断增长,国内学界有必要对各国移民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并从中获得借鉴。

虽然移民国家的主要代表加拿大与美国都自称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尊重法治和人权,惟恐自己受到种族歧视的指控,但实际上歧视性移民政策在这两国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并未完全消失。不过这两个国家的决策者在制定移民政策的过程中,由于政治文化及制度上存在差异,政策的实际效果仍然大不相同。下文将在收集和分析两国移民资料、民调机构及公共舆论对本国移民政策和移民现状反应的基础上,对上述移民理论进行检验。

三、美国移民政策的优先考虑原则

从目前来看,大多数人选择移民到美国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家庭、就业和人道主义(主要是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美国移民政策倾向于优先考虑家庭团聚的原则。比如2010年移民到美国的合法移民者中,66%以家庭团聚为由得到的合法身份;14%以就业为由获得的合法身份;13%的人通过调整他们最初的难民或寻求庇护者身份来得到合法身份;剩下其他的移民则是通过一些难以界定的方式得到的合法身份,例如被多元化移民签证项目选中的人及投资商等(Balbuenaand、Batalova 2014)。

美国移民政策是不同道德、政治和经济立场之间调和与平衡的结果。这些立场的传递者是民众,接收者则是决策层。正如马丁(Martin 2003)在影响移民政策的社会行为体分类研究中提到的,在移民政策的社会行为体中,一方认为移民将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造成威胁,而另一方则持相反看法,他们认为移民行为将有助于保持家庭的完整统一。现在大部分关于移民改革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移民者的作用尤其在政治参与进程中的作用方面。2000年,在美国居住的3210万外籍人士中有34%得到了美国国籍。到2011年,3960万外籍人士中有39%加入了美国籍。入籍率的增长表明了移民的政治参与有增强的可能性,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移民美国。

移民可以经常通过一些全国性以及社区活动来表明他们的政治心声。社区活动可以为移民可以为身份各异的入境者提供表达自己政治意见特别是和移民有关的政治意见的渠道。正如查韦斯(Chavez, 2008)所说“社区认同感不仅仅取决于移民的入境身份同时也受到社会关系、文化信仰和文化实践的影响”。而移民参政通常情况下是通过选举以及各种参加各种非正式的社会和文化团体来实现。而且他们可以通过这些机制来保障自身的各种权利,比如使自己能以所在州的学费标准接受高等教育和驾照考试学习等。

相关数据显示,即使大体上来讲美国人这些年来是倾向于抵制移民的,但家庭团聚仍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Harwood 2015)。2014年11月20日奥巴马总统宣布的暂缓驱逐非法移民出境的行政命令反应了其对于民意的回应。这些非法移民中就包括“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留者的父母”。这可能是公众支持家庭团聚的实例,因为它体现出的价值观与美国公众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经济移民则会引起民族主义情绪,美国人恐惧陆续到来的移民会抢走自己的工作。不过多数移民者选择移民时家庭与经济原因常常兼而有之。

比起合法移民,美国公众对非法移民的关注度更高,同时反对声音也更大。美国公众舆论数据库2007年的一项分析表明,75%的受访者认为近年来大多数移民到美国的人是非法移民。在这种情况下,相当多的美国人只要一提起移民便会有反感情绪。借用埃斯彭沙德(Espenshad, 1993)的话讲,非法移民或那些被视为非法的移民就是“便利的替罪羊”,因为他们常常被指责为造成犯罪和失业等问题的罪魁祸首。

首。很多人认为他们压低了工资标准,因为他们愿意接收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报酬。根据皮尤中心 2016 年 9 月出具的最新报告,美国目前有 1100 万非法移民,约占全国人口的 3.5%,这其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墨西哥(超过半数)或其他拉美国家(超过 30%)。而在 2010 年的人口普查中,拉美裔已取代非洲裔成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在 2013 年拉美裔已占据了全美人口的 17.1%;而据预期,到 2050 年,拉美裔将达到 1.32 亿,占据全美人口的 30.2%。面对这种趋势,美国两大党都忧心忡忡且争吵不断。共和党内以当选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势力坚决反对非法移民,甚至连合法移民政策都开始质疑。比如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明确表示不欢迎穆斯林移民入境,并宣称会在美墨边境筑一道隔离墙。传统上得到拉美裔支持的民主党的态度相对温和,但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同样也希望通过增加边境巡逻和安保力量的方式来严格管控非法移民入境,特别是严防极端分子混入美国。随着拉美裔更快地融入到美国社会,其在两党政治的分野也将更为明显。从这个意义出发,移民改革可能不会撼动两党的选举基本盘,但的确会成为两党都趋于推动的政策议程。这一点在 2016 年美国大选中也表露无遗。

四、加拿大移民政策的优先考虑原则

加拿大移民政策经常被认为特别容易接收移民,但实际上仍然是有选择地接收。计分制是加拿大接收合法移民的主要方式,它明确地筛选出符合移民的条件,如青年、教育、就业能力和适应性。与美国一样,加拿大也为外国人移民加拿大提供了许多方式。永久居民身份的授予也同样是由家庭、就业和人道主义三大因素主导。从 2003 年到 2012 年 10 年间,大部分的加拿大移民是因为经济原因到达加拿大,此类移民占同时期移民到加拿大并获得永久居住权总人数的 59.4%,家庭原因移民到加拿大的平均占了 25.8%。以难民为主的人道主义移民平均占了 11.1%,而其余 3.7% 的移民则被归为“其他”类别移民。人道主义移民和“其他”类别移民的数量是相对一致的,都只有轻微的波动,经济移民的数量似乎有一个上升趋势,家庭类移民略有下降趋势。

2013 年的数据显示,经济移民占新永久居民的 69.3%,而家庭移民已经下降到 18.2%,人道主义移民占 9.2% (Bragg 2013),该数据也更有力度地说明了上述的变化趋势。在就加拿大移民问题而进行的企业游说中,鲁多维奇·雷亚特(Rheault 2013)发现随着企业游说的增多,加拿大移民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加拿大临时工数量的增加。基于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的划分,外国临时工人项目(TFW)包括五个级别的外国临时工岗位。虽然外国临时工项目使雇主能够光顾外国劳动力市场并考察相关技能,但该项目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不如永久居留权那么具有吸引力。例如,临时工不允许携带家属,并且在加拿大最多只有四年的合法停留权,四年期满后,他们必须离开至少四年才能再次获得此资格。TFW 项目一直以来都存在并在 2002 年得到了扩充,参与者的数量从此开始增长。到 2006 年,参与该项目的临时工数量已经超过了永久居民的移民者数量,到 2012 年,已经达到了 43.2682 万人(Bloemraad 2012)。2012 年,TFW 项目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如提高了联邦技术工人项目的资格标准,增加了公民入籍测试的难度,同时及格分数和语言要求也更加严格。

美国与加拿大移民辩论一个关键区别在于美国主要担心墨西哥人和中美洲人的非法入境问题,而加拿大更关心的是移民者的质量和就业能力。加拿大的移民政策修正案似乎强调了在接收技工问题上要更多地考虑企业利益,关心经济融合的加拿大民众也支持移民政策的改革。自加拿大 1976 年移民法案通过以来,关于家庭团聚与经济发展孰轻孰重的辩论就屡屡出现。一直以来,人口、经济利益、企业及公众的意见都对加拿大移民政策的修改有影响并且会一直保持下去,因为 70% 的加拿大人认为移民是一个加强经济的机制。同样的,赖茨(Reitz 2005)也曾提出加拿大移民政策的调整是为了应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假设。尽管加拿大的一些省区具有特权,如《加拿大——魁北克协议》授予魁北克自己选择移民的权利,但加拿大总体移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遵循经济发展为主的原则。不过,最近 TFW 项目的变化与加拿大民众的偏好之间有所冲突。相对于暂时性居民,80% 的加拿大民众更支持永久移民,在这些变化过程中伴随着

大量的小众民意征询和议会辩论。

加拿大对移民数量没有明显的限制,很大可能是因为加拿大需要移民来维持甚至是增加其相对较小的人口数量。然而,这个说法面临着两个挑战。第一个是“一个先进的工业社会需要技术娴熟的劳动力但不一定需要靠扩大人口来增加生产力”(Li, 2014)。该主张有力地说明了为什么加拿大最近新增了大量的外国临时务工人员,他们的到来增加了加拿大的经济生产力,但是他们却没有可能永久地待在加拿大务工。对于更加开放的移民政策来说,第二个潜在的挑战是加拿大可能没有能力容纳大数量的移民。加拿大虽然国土面积辽阔,但真正适合居住的地区仍是靠近加美边境的城市带,广大的北方地区人烟稀少。这两种解释反映了加拿大人支持选择性接收移民的观点,他们更倾向于支持接收高技能或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这意味着那些因为家庭原因或人道主义原因而来到加拿大的人需要社会救助的可能性更大。相比之下,经济移民更有可能是高技能人才或高等教育人才,因此他们更有可能为加拿大带来经济利益。

加拿大移民政策一直因其公正的计分系统而广受赞扬,该计分系统为外国人提供了移民加拿大的方法,即使是没有亲戚在加拿大的也可以通过此系统进行移民加拿大的申请。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对种族民族多样性、移民政策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满意度很高。例如,“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构成是这个国家最好的一件事之一”的声明得到了44%的受访者的“强烈同意”以及40%受访者“有点同意”的选择。同样,64%的受访者表示同意“不同文化的融合形成了一个更丰富,更宽容的社会”(Saroka, Robertson, 2010)。虽然加拿大决不是一个种族或民族乌托邦,但公众对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意见也多是中立或支持,这与其移民政策争论较小的现实情况也是一致的。

由于拥有广泛的民族、种族、宗教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和政治利益,加拿大的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当代移民加拿大主要是亚洲人,其中中国人、菲律宾人和印度人最多。然而加拿大的亚裔移民群体的种族认同感比不上美国的拉丁裔移民。例如,人们通常认为来自拉丁美洲或加勒比海拉丁裔移民——如非裔哥伦比亚人、危地马拉土著及意大利血统的阿根廷人即使彼此之间种族不同也会享有相同的拉丁裔身份。他们共有的拉丁裔身份是基于共同的伊比利亚殖民历史、相同的宗教信仰(至少在原则上)等。无论其先前的种族身份是什么,到达美国之后都自动转变为“西班牙裔人”身份的认同感。然而,亚洲移民却不可能有类似的经历,特别是在鼓励多元文化和维护个体文化特征的加拿大。尽管他们都被叫做亚洲人,但还是让人难以想象让中国人、菲律宾人和印度人拥有统一身份认同感,他们也就相应地缺乏影响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力量。

五、美加鼓励移民融合政策上的差异

虽然美国和加拿大都鼓励移民融入本国社会,但这两个国家鼓励融合的机制却是不同的。美国依靠移民者个人、他们的家庭及社会关系来促进融合进程,整个过程中没有联邦或州政策上的支持,也没有资金上的支持(难民融合除外)。而加拿大则主张在省和联邦两个层面上制定相关政策,比如给予大量的经济支持来完成融合进程(Kobayashi, Li, Teixeira, 2012)。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移民政策开放接收非欧洲国家人民的移民之后,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正式的融合战略在加拿大得以实行。多元文化主义在1971年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1982年被写入宪法,1988年形成了一系列具体法律条文。多元文化法案包括鼓励去除民族、种族和文化的紧张局势和层级结构,消除种族、民族和宗教歧视以及促进就业公平。

虽然多元文化主义可能会限制移民融合进程,但加拿大仍然鼓励这一政策。1971年时任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首次发表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言论,称“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正是因为文化认同和文化适应有助于和平地促进融合进程,从移民和本地人两方面调整促进融合进程”。根据博鲁姆里德的观察,种族和加拿大国民身份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Bloemraad, 2012)。然而,尽管加拿大移民在融入加拿大社会的过程中被鼓励去保持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但社会、经济和政治融合意味着加拿大移民必须遵循一定的加拿大标准以实现融合,像李(Li, 2014)指出的那样,“多元文化

主义在评估移民时也奉行一致性和遵从性的概念,同时多元文化主义也希望移民可以接收主流价值信仰,遵从大多数加拿大人的生活标准和行为方式。”原则上,多元文化主义把自己努力打扮成是移民和社会均能接受的主张。然而在现实中,移民给加拿大社会带来的改变通常被认为是消极的,而移民者的改变则被认为在融合进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也认为能产生积极的效果。这也使得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者认为政治决策只是一种象征。尽管存在缺陷,多元文化主义仍被作为加拿大社会的一大特征而被民众广泛接受,并在加拿大人的民族认同感中始终保持中心地位。2010年一项聚焦加拿大的民意调查显示,多元文化主义是加拿大人民自豪感的前九大来源之一。

六、美国和加拿大民众对移民政策看法的差异

2010年,加拿大和美国的移民人口分别为720万和4280万,分别占各自国家人口总数的21.3%和13.5%(Kobayashi、Li、Teixeira 2012)。在美国,公众普遍认为移民是不利的,甚至在经济稳定的时期也是如此。加拿大给人们的感觉似乎是欢迎移民的。但西蒙和林奇(Simon、Lynch,1999)的研究显示,支持增加移民数量的美国民众最高的百分占比为13%,而支持增加移民数量的加拿大民众最高的百分占比为17%。在两国各自的民意调查中,32%—55%的加拿大民众支持减少移民数量,33%—66%的美国民众支持减少移民数量。这些数据显示,尽管加拿大人更加支持多元文化主义,似乎也更容易接收移民,但加拿大人民与美国人民对待移民和移民政策的态度并没有很明显的差异。加上加拿大占其人口20.6%的680万个永久居民是外国出生的,他们对移民问题的热情实际的可能会比期望的要小。正如霍金斯(Hawkins,1988:34)对这种冷漠的解释,“移民既不是一个国家神话,也不是被广泛认为是影响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公共政策的一个领域,移民引起了一些常规性的支持但却缺乏真正的情”。事实可能就是如此,因为移民是加拿大人生活中的规范性的一部分,特别是在移民主导的城市地区——如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在这些地区移民随处可见,而且那里的人们普遍认为移民在加拿大的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相比之下,美国的公众认为通过立法,设置物理障碍如制定相关政策、执行相关法律、建设围墙等方式限制移民数量——特别是非法移民的数量是可行的。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民意调查报告,早在2006年就有10%的美国人认为移民问题是美国最重要的问题,从那以后该比例不断攀升(Brader、Valentino、Suhay 2008)。在对美国民众对移民问题的舆论分析中发现媒体对边境地区的报道要多于其他地区,进而影响到不同地区的民众舆论。这是美国与加拿大的一个重要不同,因为美国与墨西哥这样一个欠发达国家接壤,因此不得不面对大量的非法移民和人们对其越来越深的敌意。

美加民众对移民政策看法出现差异的直接原因在于经济。希特林(Citrin,1997)等人指出,那些最易受到经济变化影响的人对移民的反对意见最大。具体而言,那些对经济状况持悲观意见的人可能认为移民是一种就业威胁和税收配置威胁。需要强调的是,公众对移民问题的看法并不是由个人情况或个人利益驱动的。他们认为“限制性政策与经济衰退之间的历史联系,可能有更多与激进分子活动及利益群体有关。公众对移民的反对程度是由经济恐惧引起的,所有这些担心都可以从其集体趋势的看法而不是个人脆弱性的感受中看出。”从近十年的情况来看,美国经济不断下滑,国力大不如前,而加拿大经济在西方国家中表现还算不错,因此加拿大人在承受移民对经济的冲击问题上比美国更有自信。

另外移民问题上的舆论主要来自民众对某个特定种族的观念和情感,而不是基于其自身的利益。由于种族或民族成见,民众将外国人和非白人归为一个单一、不受欢迎、甚至具有一定威胁性的群体之中。这种仇外心理可以归因于其对移民改变其主导文化的恐惧。在美国,当移民文化与主导文化相一致时,公众的这种恐惧心理有所减轻,如早期的移民潮。例如,西蒙和林奇(Simon、Lynch,1999)注意到,“美国公众早期的移民表现出积极和赞同的态度,而对于那些在民意调查期间来到美国的移民则持负面情绪。”在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强化了其庞大而多样化的移民人口,鼓励移民在通过学习加拿大语言和习俗来适应加拿大文化的同时保持自己的文化。也许正是这样的政策减少了本地人和移民之间的障碍而使得加

拿大公众对移民的反对意见不像美国那样强烈。

七、结 论

美国公众对于移民,无论是合法与否,在很大程度上都持反对意见。这似乎与其强调如何使非法移民合法化的政策相矛盾。政策有时会公然无视公众舆论,因为游说者比公众更具影响力。当然投票的公众也是很重要的。然而现实中也存在一些应被予以考虑的其他声音,如青年学生,尽管他们在政治参与上有限制,但仍是移民改革提倡运动的主力军。尽管公众对移民政策的影响参差不齐,但是拉美裔移民对美国移民政策的影响表明,公众的影响并不总是仅限依靠经济实力甚至是投票权,而是也可以通过共同的目标、人口数量、组织和变革动力来影响移民政策的制定。拉美裔移民的政治权力在2012年总统竞选期间得到了充分展示,当时奥巴马总统单方面签发了暂缓遣返政策(DACA)。在选举之后,共和党意识到若想赢得多数的选票就需要考虑这部分人群的利益。

尽管自2006年由保守党领导以来,加拿大提高了移民准入限制,但从加拿大公众对移民者的舆论上来看,并没有出现相似的限制模式。与其他接收移民的工业化国家相比,加拿大人被称为“迄今为止对待移民问题最开放最客观的民众”。比起美国和西欧,加拿大民众对移民者和移民问题更乐观。但这并不是说美国的拉美裔移民在美国是一个庞大而僵化的组织,也并不意味着跨文化利益在加拿大不存在。然而,美国非法移民数量较多可能是另一个美国人民对移民支持甚少的原因。相比之下,加拿大更倾向于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实现移民大融合。

通过比较两国移民政策演变的过程我们发现,造成两国政策不同的最关键因素还是政治背景和制度的差异。最近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见时在移民问题上暴露出的分歧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加拿大实行的议会内阁制中,内阁的主导地位可以保证政策制定过程的独立运作,较大地限制了移民群体影响具体的政策议程的能力。而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则限制了行政部门在制定政策上的独立性,移民群体能通过国会影响具体政策议程。在加拿大,行政官员相对独立。他们主要的挑战来自于如何在政府的核心目标上取得平衡:消除种族歧视,控制担保移民,鼓励技术移民。计分制度满足所有这些目标。相反,美国决策过程的开放性以及国会在移民立法上的重要地位,使得移民政策更多地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行政部门官员在制定政策过程中,自始至终都需要与各个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这些差异就导致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实施要比美国温和有效。

参考文献:

- BRUBAKER R. 1992.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OCHMAN G. 1999. *Mechanism of Immigration Control: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uropean Regulation Policies* [M]. Oxford: Berg Publishing.
- BALBUENA C, BATALOVA J. 2014. Green Card Holders and Legal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J].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12): 8.
- BLOEMRAAD I. 2012. *Understanding 'Canadian Exceptionalism' in Immigration and Pluralism Policy* [R]. Washington, DC: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 BRAGG B. 2013-06-13. A guide to Canada's Changing Immigration Policy [OL]. *Ethanol-Cultural Council of Calgary (ECCC)*. [2014-11-13]. http://www.ecccalgary.com/wp-content/uploads/Immigration_Policy_Guide_06-13.pdf.
- CHAVEZ L R. 2008. *The Latino Threat: Constructing Immigrants, Citizens, and the Nation* [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ITRIN J D, GREEN P, MUSTE C, WONG C. 1997. Public Opinion Toward Immigration Reform: The Role of Economic Motivations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9 (3): 858-881.
- ESPENSHADE T J, CALHOUN C A. 1993. An Analysis of Public Opinion toward Undocumented Immigration [J]. *Population Re-*

- 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 12 (3) : 189 – 224.
- FREEMAN G P , BIRRELL B. 2001. Divergent paths of Immigration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 27 (3) : 525 – 551.
- GUIRAUDON V , JUPPKE C. 2001. Controlling a New Migration World [M]. New York : Routledge.
- HARWOOD E. 2015.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 S. Immigration Policy [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 487 (1) : 201 – 212.
- HAWKINS F. 1988. Canada and Immigration Policy : Public Policy and Public Concern [M]. Montreal :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HOLLIFIELD J F. 1992. Immigrants , Markets , and States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war Europe [M]. Cambridge ,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JOPPKE C. 1998. Why Liberal States Accept Unwanted Immigration [J]. World Politics , 50 (2) : 266 – 293.
- LI P S. 2003. Deconstructing Canada ' s Discourse of Immigrant Integration [R]. PCERII Working Paper Series , Working Paper No. WP04 – 03. [2014 – 11 – 11]. <http://www.urbancentre.utoronto.ca/pdfs/elibrary/Cda-Discourse-Immigrant-Int.pdf>.
- MARTIN S. 2003. The Politics of US Immigration Reform [J].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 74 (1) : 132 – 149.
- REITZ J G. 2005. Tapping Immigrants ' Skills : New Directions for Canadian Immigration Policy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J]. IRPP Choices , 11 (1) : 2 – 18.
- RHEAULT L. 2013. Corporate Lobbying and Immigration Policies in Canada [J].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46 (3) : 691 – 722.
- SAROKA S , ROBERTON S. A. 2010. A Literature Review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on Canadian Attitudes Towards Multiculturalism and Immigration 2006 – 2009 [OL].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2014 – 03 – 31]. <http://www.ci.gc.ca/english/pdf/research-stats/2012-por-multi-imm-eng.pdf>.
- SIMON R J , LYNCH J P. 1999.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Public Opinion toward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Policies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 33 (2) : 455 – 467.
- VALENTINO B T , SUHAY E. 2008. What Triggers Public Opposition to Immigration? Anxiety , Group Cues , and Immigration Threat [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52 (4) : 959 – 978.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s of Canada and the U. S. Immigration Policy

CHEN Hongqiao

(The Center of Canadian Studies ,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 Guangzhou 510420 , China)

Abstract: The U. S. and Canada are neighbor countries in North America. Although they have very similar liberal democratic and political cultures , these two countries ' immigration policies are quite different. While the U. S. immigration policy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family reunion , Canada ' s is m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demand and employment ability. By applying the theory of immigration politics , this paper discovers that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opinion on immigration policy in the U. S. is larger than that of Canada , in which a large part of the reason is the cohesion of Hispanic immigrants in the U. S. i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of Asian immigrants in Canada. The Canadians focus on multicultural policy , but also limit the ability and tendency of individual groups to dominate the immigration policy. However , the key factors that caus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e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and system.

Key words: immigration policy ; differences ; Canadian immigrants ; the U. S. immigrants

[责任编辑: 萧怡钦]